

毛主席视察黄柏山村棉田

郝启明

每逢金秋时节,一览棉海连天,银珠闪烁之际,毛泽东主席 1958年视察黄柏山村的情景就浮现在我的眼前。

黄柏山村,现属湖北鄂州市临江乡,北临长江,南靠武九铁路,武黄公路贯穿其中,是全市棉花等经济农作物主要产区之一。原为鄂城县霞光高级农业合作社, 1958 年成立人民公社后为鄂城县旭光人民公社黄柏山大队。

解放前,临江贫苦农民一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当地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临江得胜洲,灾害年年有,水涨一片白,水落尽沙丘。苛捐杂税重,穷人如马牛,芦花裹在身,乞讨四方走。”解放前黄柏山村 353 户人家,就有 300 户种佃田、卖长工,46 户讨米要饭、卖儿卖女,27 位贫苦农民惨遭日本侵略军和国民党军队杀害……是共产党、毛主席把临江人民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走上了社会主义金光大道。

1958 年,我正在刚刚成立的旭光人民公社任党委书记。当时,在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下,从中央到地方,层层解放思想,大胆试验,努力发展农村经济。我们在旭光突出抓了两件事:一是社办工业,二是高产试验,引起上级领导的重视,被省里列为对外国人开放的重点单位,吸引了不少中外人士前来参观访问。

自解放后，经过土地改革，农民翻身有了自己的土地，后又走上合作化、集体化道路，集体经济从无到有，逐渐增强。我们依靠集体经济的力量，先后办起了农副产品加工厂，农具制造厂和颗粒肥料厂。农村办工厂，农民当工人，在当时是破天荒的事情。尽管我们的工厂规模小，厂房简陋，被群众称之为“小小工厂”；但党中央、毛主席知道后很重视，称赞“小小工厂”是个“创举”；毛主席还亲自布置把介绍“小小工厂”的文章刊登在《红旗》杂志上，向全国推广。1957年以前，旭光的农业生产产量偏低，棉花亩产几十斤，水稻亩产也不过500斤左右。为了夺取农业高产，我们大办高产试验田，改良品种，推广栽培新技术、新方法。当时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也到旭光办了一块棉花试验地，并亲自扶犁耕耘。1958年，水稻、棉花普遍长势良好，丰收在望。8月底的一天，张体学省长匆匆赶来，神秘地对我们讲：“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毛主席可能要到旭光视察。”消息传开，大家都兴奋不已，盼望着早日见到毛主席。

9月15日，晴空万里，阳光灿烂，临江大地充满丰收的喜悦，送棉、晒棉的人们熙熙攘攘，采摘新棉的欢声笑语在田野里荡漾。快到中午12时，一队小车在临近武黄公路的一块试验地前停了下来，从一辆黑色轿车中走出一位身材高大、容貌慈祥的老人。啊！是毛主席，毛主席果真来了！只见毛主席身穿白色衬衣，米黄色西裤，脚穿一双圆口青布鞋，大步向棉田走来，跟随他的有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等领导同志，在黄柏山大队党支部棉花试验地边，毛主席停下步子，饶有兴致地看了看写有高产目标的试验地标牌，用手比划着，朝身边的同志点点头，眼里露出赞许的目光，离

毛主席最近的黄柏山大队妇女队长廖继安迎上前去，毛主席握着她的手，问她叫什么名字，今年的收成如何。廖继安激动得泪流满面，并一一回答毛主席的问话。这时，很多群众从四面八方涌来，大家为能亲眼看到日夜思念的领袖而激动不已。毛主席一边向大家招手致意，一边顺着机耕路朝前走。一条又宽又深的沟挡住了去路，周围的同志劝毛主席不要过去，可毛主席笑了笑，摆摆手，迈着大步跨了过去。在沟边，毛主席抚摸着面前的一株棉花，数了数满枝的棉桃，询问身边的两位老农：“这一斗地能摘几多花呀？”

老农答道：“七十多斤。”

毛主席笑了笑，又问：“一斗田能收几多谷呢？”

老农兴奋地说：“现在能打 500 多斤，今后一定不止。”

“对对！”毛主席连声说道：“应该这样努力。”

时间一晃过去了近半个钟头，毛主席面带满意的神情，驱车离开临江，向黄石方向疾驶而去，望着远去的车队，我们激动的心情久久难以平静。在兴奋之余，大家又为没有向毛主席汇报工作、没有留他老人家休息一会而深感遗憾。半个月以后，我们从《人民日报》得知，从 9 月 4 日到 26 日，毛主席的足迹踏遍了大江南北。先后视察了武汉、鄂城、黄石等地的工厂、学校、农村和矿山。毛主席的亲临视察，给我们这些在基层工作的同志巨大的鼓舞，“应该这样努力”的亲切话语一直激励着临江广大干部群众发奋努力，发展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毛主席离开临江快半个世纪了，黄柏山村人民在他老人家当年停留过的地头建起了一座纪念馆，簇拥纪念馆的仍然是一片茫茫棉海。金秋季节，棉株昂首，花桃怒放，仿

**佛又在接受伟人的检阅，仿佛在向前来参观的工人、农民、
学生、干部倾吐临江人民对领袖的思念……**

（作者为鄂州市政协原副主席）

陈毅元帅来鄂城

黄 志 华

1964年10月14至16日,这三天,中国和苏联发生了震动全世界的两件大事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苏联赫鲁晓夫下台。鄂城也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10月14日,共和国元帅陈毅来鄂城视察。当时,我在中共鄂城县委工交部工作,还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县委抽了六位党员负责接待的具体工作,我是其中之一。

金秋十月,天空阳光灿烂,大地果实累累。不知怎的,鄂城西山10月14日这天游玩的人格外多,九曲亭里,洗墨池旁,古灵泉寺内外,人来人往,非常热闹。上午快10点钟了,两部小轿车开到了古灵泉寺门前。那个年代,县城里很少见到小轿车,大家都围拢来,瞪大双眼瞄着下车的人是谁?只见一位大首长模样的人戴着一副黑色的眼镜,不慌不忙的走下车来。这时人群中有位年轻的小伙子眼尖,突然大声一喊:“他是陈毅元帅!”他这一喊不要紧,人们顿时闻声从四面八方围了过来。陈毅元帅对大家说:“你们怎么知道我是陈毅?”那位小伙子说:“我在电影里看到过。”因为那时还没有电视机,不像现在中央领导人常在电视里露面,大家都很熟悉。陈毅元帅连连点头,他面带笑容地说:“同志们好!”他接着用手指着站在他身旁的一位中年男人说:

“同志们，我给你们介绍，这就是你们湖北省的省长张体学。”他的话音一落，全场的掌声、欢呼声，响彻了整个山谷，经久不息。

陈毅、张体学到古灵泉寺看了看，庙里的住持拿出东坡饼来招待陈毅。这东坡饼是有来历的，北宋年间，大学士苏东坡被贬黄州，常常来到西山，庙里的和尚常以饼相待，苏东坡很爱吃，于是和尚就将此饼叫‘东坡饼’。上世纪五十年代，西山住持和尚融广还将东坡饼送到北京献给了毛主席。陈毅尝了尝，连连赞叹道：“味道不错，不错！”当时三年困难时期刚过，粮食很紧张，城镇居民口粮定量供应，糕点副食都要收粮票。当陈毅元帅了解到东坡饼每个还要收二两粮票，连油也不能保证供应时，连忙对张体学说：“这个事情只有你能解决哟。”张省长忙说：“你们写个报告，给你们解决了吧。”

游完了古灵泉寺后，陈毅来到西山顶上的望楚亭，忽然背诵起黄庭坚的《松风阁》诗：“依山筑阁见平川，夜阑箕斗插屋椽，我来名之意适然。老松魁梧数百年，斧斤所赦今参天。凤鸣娟皇五十弦，洗耳不须菩萨泉。嘉二三子甚好贤，力贫买酒醉此筵。夜雨鸣廊到晓悬，相看不归卧僧毡。泉枯石燥复潺湲，山川光辉为我妍。野僧旱饥不能饘，晓见寒溪有炊烟。东坡道人已沉泉，张侯何时到眼前？钓台惊涛可昼眠，怡亭看篆蛟龙缠。安得此身脱拘挛，舟载诸友长周旋。”，但是周围许多人都不懂他念的是什么内容，连张体学省长也是一脸茫然。他的秘书就告诉大家，这是宋代诗人、大书法家黄庭坚在鄂城西山留下的千古名篇。陈老总连连说：“可惜松风阁不在了，今后应当把它恢复重建。”大家连

连点头，从内心里敬佩陈毅元帅渊博的知识和高瞻远瞩的眼光。

踩着荆棘丛生的小路，陈老总又转了几个山峰，他的兴趣仍然很高。他对鄂城县委领导同志说：“西山不亚于庐山，你们要把它建设好。”

中午，陈毅元帅下山到县委机关食堂吃午饭。当时任县委秘书的陈帮敏也是接待组成员之一。机关食堂条件十分简陋，实在拿不出什么东西来招待陈毅元帅和张省长。可是他们又是大家内心非常敬佩、十分难得来的客人，小陈想了又想，只好找了一点鄂城的土特产。他特地请樊口大闸的职工专门打捞了两条二斤重的鳊鱼，这可是正宗的武昌鱼，还弄了一些新鲜蔬菜。张体学解放前曾在鄂城打过游击，在梁子岛住过一段时间，他喜欢吃鄂城的“臭皮子”，这是一种豆制品，以鄂城太和镇最有名气，于是也专门买了十几张。还用油炸了一些细“餐子鱼”。这些东西成本不高，但很有地方特色，书记、县长陪客又不难为情。陈毅元帅、张体学省长加上陪客的县领导，一桌 10 个人。最后餐桌上的“餐子鱼”和“臭皮子”没有吃完，张省长说：“这些东西味道好，餐子鱼和臭皮子给我包起来，带到黄冈去吃。”

14 日这天，正碰上县委召开各区委书记会，参加会议的同志和县委机关干部，听说陈老总和张省长来了，一致要求见见。县委领导向两位首长汇报后，他们满口答应了。消息传来，大家十分高兴。下午 2 点，陈毅元帅在县委接待室稍稍休息后起床了。要求接见的几十位同志，站在县委办公室门口下坡的地方，面向接待室客房门口，个个兴高采烈，心情激动。一会儿，陈毅元帅身穿一件白底子、蓝条子

的绸褂子,走到等待接见的同志们面前,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他扬起右手说:“同志们好!”同时又说:“凡是湖北的同志举手。”湖北籍的同志应声举起了手。站在我旁边的县妇联主任张奎是河南人,没有举手,其他外省籍的同志也没有举手。陈毅元帅面带笑容,环顾了在场的人,再次扬起右手,挥了三、四下,便上车走了。

陈毅元帅走后,大家久久不肯离开,议论纷纷 有的说怎么光叫我们举手,不跟大家讲几句话呢?我的嘴巴长些,先开口说了一句:“陈毅元帅很有外交家的风度,他叫湖北人举手,是跟大家开个玩笑,你一举手就不能鼓掌了。再说,他不愿意到处作指示。”啊 是这个意思,是这个意思,还是黄秀才说得对。”大家会意的哈哈大笑了。

陈毅元帅要过江到黄冈,他的车子从县委机关后门(当时的大门)经电影院(现在的人民电影院)出小北门到轮渡码头。小车上船时,出了一点故障——张省长的苏式伏尔加小轿车底盘太低,上船时尾部擦坏了。船长急得一身汗,他想 把省长的车子弄坏了,不光是我的错,就是黄冈地委也不好交待。陈毅元帅看在眼里,故意提高嗓子当着船长和省长的面嚷道:“这不得了哟 你们的船把省长的车子碰坏了,赔得起吗 哎 也难怪,船太小了,过道空间太窄,开车的、开船的都不好办。张省长,你当省长的,批几个钱,让他们打条大船不就行了?”

事情就这样巧,坏事变成了好事。陈毅元帅的话很灵验,事后据说张省长批了 70 万元,打了两条大渡船。从此,鄂城过黄州就由装几十人的小汽船换成了能装 200 多人的大船渡江,两岸人民无不拍手称快。

时间过去了 39 年，我也由一个小伙子进入了退休年龄，但陈毅元帅来鄂城的那段情景一直浮现在我脑海里。他那平易近人，幽默风趣的音容笑貌，鄂城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如今，陈毅元帅的夙愿正在变为现实：黄庭坚松风阁、孙权避暑宫已经修复，武昌楼、张裕钊陵园、翠景园、秀园等一批景点相继建成，西山已成为江南佛教旅游名山。西山所在的鄂城县，1983 年乘改革开放的春风，升格为省辖鄂州市，已成为闻名遐尔的旅游城市。

（作者为鄂州市原冶金工业局局长、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原主任）

革命先驱范鸿劼

曹焱明



范鸿劼

中共‘一大’召开时,全国仅有党员 50 多名,其中鄂州籍的就有两名 范鸿劼,刘伯垂。

范鸿劼是中共‘一大’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是我党早期北方区委主要负责人之一。他 1918 年考入北京大学学习,这期间,他受到十月革命和革命先驱李大钊的影响,较早地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他积极参加了‘五四’爱国运动,发起和组织了‘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参与创建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曾任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委员、组织部长等职务,组织领导北方革命群众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的斗争。1927 年范鸿劼与李大钊等同时被捕,4 月 28 日一起壮烈牺牲,时年仅 30 岁。

锋芒初露

范鸿劼出生于 1897 年,是湖北省鄂州市葛店镇人,家中兄弟 6 个,他排行第六。范鸿劼小时读书,勤奋好学,品

学兼优,聪颖过人,乐助同学,师生、邻里无不喜爱。1918年他考入北京大学理工预科学习,后又到化学系、英文系读书。在此学习期间,旧中国处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下,国家主权丧失,经济命脉掌握在外国人手里,中国人民陷入极度屈辱的深渊之中。但是,中华民族优秀儿女李大钊等革命先驱,不甘心忍受这种屈辱的生活,在黑暗中毅然举起了马列主义大旗,为拯救国家命运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进行英勇而顽强的反抗斗争。此时,正在北京大学读书的范鸿劼是学生中最为活跃的一员,他既是北大英文系高才生、英文系学生会领导成员之一,又是北京大学学生会评议部总务委员,在北大学生中崭露头角,为同学所瞩目。“五四”运动前夕,世界格局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俄国十月革命取得了胜利。当时,北京大学的名流学者到处讲演,校长蔡元培在天安门广场讲演“劳工神圣”李大钊教授作题为《庶民的胜利》的报告,歌颂了十月革命的成功,马克思主义的胜利。范鸿劼积极组织同学聆听了讲演,从中受到了教育,得到了启示,对基本的革命道理和十月革命有了初步的了解。

1919年1月,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北京,犹如晴天霹雳,引起了北京地区各大专院校学生极大愤慨,范鸿劼参与了北京大学率先发起、并邀请北京各大专院校学生代表参加的北大全体学生大会,起草宣言,决定5月4日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活动。5月4日,北京地区十几所学校的学生手持小旗,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等口号,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游行队伍冲破军警阻拦,齐集天安门广场,散发了传单,宣读了《北京学生界宣言》,庄

严宣告：“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低头！同胞们起来！”游行示威给了帝国主义的走狗、卖国贼以沉重的打击。之后，北京各专科以上学校学生实行总罢课。北京大学学生干事会宣告成立，范鸿劼负责总务股，承担筹集活动经费工作，经过动员、积极工作，许多学生踊跃捐献达数千元。与此同时，他还积极参加营救被捕学生活动，当蔡元培校长受当局压力‘引咎辞职’时，范鸿劼又在李大钊的指导下，投入到挽留蔡元培校长的斗争中。1920年，天津学生为反对中日直接交涉山东问题，遭受反动军警的阻扰与镇压，多名学生被捕。消息传到北京大学，学生们义愤填膺，怒火满腔，担任北大学生评议部总务委员的范鸿劼立即以学生会的名义发出“万急通告”：“……山东直接交涉问题到了万急了，我国人民当亡国奴的时候快到了。我们再不起来奋斗牺牲，天津的惨剧转眼就要到北京了……”并由范鸿劼等人主持召开了文、理、法科全体学生大会，决定以罢课、外出讲演等行动来声援天津被捕学生。当范鸿劼等几十名学生在前门一带讲演时，遭到反动军警驱赶、殴打、逮捕。范鸿劼被捕后，“平民教育讲演团”的同学、战友李荟棠在《北京大学学生周刊》上发表了《欢送范鸿劼君入狱》的诗歌，对他的爱国革命行动，给予了高度的赞扬。后在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下，反动军警不得不释放被捕学生，范鸿劼出狱后，继续斗争。

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历时50余天，到6月28日北京政府代表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遂告一段落。范鸿劼作为参与者和组织者，在运动中起到了核心领导作用，同时也得到了锻炼，更加成熟坚强。

宣传马列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这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它象一盏明灯照亮了中国革命的航向，点燃了革命青年那一颗颗火热的心。李大钊等一批进步知识分子，较早地理解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意义，并热情宣传马克思主义，培养和引导青年学生走向革命道路，正是在他的直接培育影响下，范鸿劼亦较早地接受了马列主义。他和北大学生邓中夏、黄日葵、高尚德等 19 人，在李大钊的具体指导下，经过长时间的酝酿，反复商讨，以及大量的准备工作，发起组织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从此，他如饥似渴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学说。通过学习、研究，范鸿劼脑海里长期存在的一些疑问、困惑，渐渐地得到了解答和消除，逐渐树立起共产主义信仰。他兴奋极了，把马列主义的书籍在同学们中间辗转传阅，和同学们一起认真地学习，热烈地讨论，使大家对学习 and 研究马克思主义充满了浓厚的兴趣。

“五四”运动之后的第二年，在共产国际代表的帮助下，范鸿劼同李大钊等人，创建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的大部分同志都成为这个小组的成员。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北京党组织决定公开“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组织。范鸿劼和邓中夏等人在《北京大学日刊》发布了《发起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启事》，同时建立了图书室。范鸿劼在研究会各项活动中，办事认真负责，考虑和处理问题全面周到，又有一定的组织能力，得到大家的信任，被推选负责英文组翻译，并兼该会图书室经理。他和罗章

龙等把搜集到的英文版、德文版的《共产党宣言》翻译印刷分发给会员阅读,扩大了会员们的视野,使一批进步青年接受了马克思的革命思想,为后来开展革命斗争活动培养和造就了一批骨干力量。

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的活动开展顺利,其影响越来越大,组织日渐壮大,会员由北京大学发展到北京其他院校,又逐渐发展到全国一些省份和地区,据统计有会员近300余人。如在湖北先后有林育南、施洋、恽代英、李求实、赵小健、许白昊等参加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这同范鸿劼的大力宣传和影响是分不开的。

组建同盟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战争结果以直系军阀吴佩孚获胜而告终。吴佩孚为了欺骗人民,提出“恢复法统”,恢复旧国会。同年7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为贯彻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建立同国民党及其他社会组织的联合战线,北京党组织决定由范鸿劼、蔡和森、高尚德、刘仁静、缪伯英(女)等人负责组建‘民权运动大同盟’这一群众团体,以便更加广泛地团结和教育广大人民进行反帝反军阀的斗争。8月‘民权运动大同盟’筹备会在北京大学召开,到会有100多人。会上讨论了“民权运动大同盟”的宗旨、名称、组织机构等重大问题。范鸿劼、缪伯英等人被选为筹备委员,负责章程的起草与成立大会筹备事务。会后范鸿劼把全部心血倾注到筹备事务工作中,他和其他有关人员夜以继日地紧张工作,使筹备工作既扎扎实实,又

富有成效。与此同时,他们在报刊上刊登了《民权运动大同盟启事》,呼吁‘凡有志争民权者,皆可加入’还到处联系群众,争取到一些社会知名人士的支持。在召开‘民权运动大同盟’成立大会时,出席人数达 400 多人。大会通过了宣言和简章,决定发行《民权》周刊。由于范鸿劼工作出色,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并担任‘民权运动大同盟’宣传股主任。

“民权运动大同盟”成立后,有力地推动着民权运动广泛地开展,发起了取消治安警察法运动,开展了驱赶教育总长的斗争。在支持和声援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的斗争中,范鸿劼与包惠僧、刘子通等人,在北京组织群众请愿,联络两院部分议员对吴佩孚、萧耀南等提出弹劾,并就劳动法案,争取工人应享有集会、结社、罢工的自由等问题进行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反动势力对人民自由的限制和嚣张气焰。“三·一八”惨案后,“民权运动大同盟”这个同国民党及其他社会团体和爱国人士结成反帝反封建的联合战线,被迫停止了活动。范鸿劼在参与和领导这一群众团体的过程中,显示了他的组织才干和一名共产党员的领导作用。

斗敌先锋

1924年3月,中共北京区委改组,范鸿劼当选为执行委员,并被推选为中共北京区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同年秋他又任中共北京地委组织部长。年底,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成立了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范鸿劼被选为委员,组织部长等职务。他与李大钊、赵世炎、陈乔年等北方区委负责人团结一致,领导了东到东三省,西到陕西北部,南到山东、河南,北到内蒙古的广大北方地区的革命斗争。范鸿劼

还经常给北方区委主编的《政治生活》周刊撰写了许多重要文章,宣传马列主义和党的纲领、方针、政策,介绍十月革命胜利的经验,揭露帝国主义侵略罪行和反动军阀丑恶面目,唤起民众起来斗争。他的文字生动,通俗易懂,深受读者的喜爱,对指导北方人民的革命运动,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925年5月。帝国主义在上海进行血腥大屠杀的消息传到北京,李大钊、陈乔年、范鸿劼、赵世炎等北方区党委成员立即行动,动员各级党组织迅速把各阶层人民组织起来。学生组织‘沪案雪耻会’,工人组织‘工人雪耻会’,在区党委的领导下,连续举行了三次空前的示威游行,有力声援了上海人民反屠杀的斗争。

“五卅”运动后,奉系军阀秉承日、英帝国主义的旨意,象一条疯狗似的扑向人民群众,张开血盆大口到处镇压国民革命运动,屠杀工农群众,封闭民众团体,剥夺人民自由。军阀吴佩孚也在日、英帝国主义的怂恿和大批军械援助下,疯狂地攻打国民革命军。帝国主义这种肆无忌惮的侵略行径,激起了中国人民极大愤怒,也激起了对帝国主义走狗封建军阀的怒吼,在全国人民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军阀的怒潮中,范鸿劼和李大钊、陈乔年、赵世炎等区委领导成员,发动各界广大人民群众,连续三次在天安门前举行大规模的声势浩大的‘反日讨张’国民示威大会,后又举行达4万多人参加的“反英讨吴”国民大会,号召人民起来与不共戴天之仇敌进行斗争,有力地推动了北方地区人民群众革命运动的发展。

1926年,范鸿劼和北方区委主要负责人李大钊、陈乔年、赵世炎以及北京地委主要负责人刘伯庄等人一道,亲自

参加并领导了北京“三·一八”请愿斗争。当段祺瑞政府血腥镇压请愿群众时,范鸿劼和赵世炎、刘伯庄等人,连夜在北京召开党、团支部书记联席会议,商讨斗争策略,并分头发动群众,为牺牲者在北京全城举行统一的声势浩大的追悼大会和隆重葬礼。人民群众的怒吼声,震撼北京全城,显示了我党领导下的人民群众宁死不屈的斗争决心。

1926年1月,范鸿劼作为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代表,参加了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期间,他和毛泽东等人被任命为大会宣传报告审查委员会委员。在讨论《中央党务报告决议案草案》中关于国共合作条款时,范鸿劼和毛泽东等人坚持反对公开中共党的组织,公开中共党员身份的提案。他旗帜鲜明地说:“共产党员负有两种革命的重担,是另有秘密组织的。我们现在只有结合革命势力实行国民革命……其它不必问及。”范鸿劼坚持了我党在国民党中的独立性和革命性的原则,维护了党组织的纯洁。

范鸿劼在革命导师李大钊的帮助下,从一名学生走上了革命道路,并逐渐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从“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的成立,直到1927年壮烈牺牲,他和李大钊既是师生关系,又是革命的同志与亲密战友。他在北方跟随和辅助李大钊工作的日子里,具有高度的组织原则,一切服从组织安排,在党内他搞过宣传、组织等多方面的工作。经过长期的锻炼和考验,证明他不愧为李大钊的优秀学生和得力助手,不愧为对敌斗争的先锋。